

商海拾遺

林學甫

香港文匯出版社 出版

執行編輯
封面設計

李漢成
陳華超

書 名
編印出版

商海拾遺

香港文匯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七號興偉中心 2 - 4 樓
WEN WEI PUBLISHING CO., LTD.
2-4/F, HING WAI CENTRE,
7 TIN WAN PRAYA ROAD,
ABERDEEN, HONG KONG.

印 刷

雅典美術印製公司
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七號興偉中心 2 樓
利源書報社

發 行

香港九龍旺角洗衣街 245 號地下
二〇〇一年七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HK\$128.00

版 次
定 價

國際書號

ISBN 962 - 374 - 076 - X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1994年6月14日作者受到江澤民主席親切接見。



左圖：1997年12月，作者隨同中華廠商聯合會首長梁欽榮、陳永棋、楊孫西、陸增鏞拜會中央統戰部王兆國部長。

下左：作者和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主任姜恩柱合影。

下圖：福建社團聯會新春團拜時，作者與特首董建華等在一起。





1991年李鵬總理、國家副主席榮毅仁接見作者及夫人林孫嫻，圖為李鵬與作者夫人握手。



作者在1991年赴新加坡參加世界華商大會時在總統府與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合影。



吳邦國副總理於1993年任上海市委書記時，對作者公司品牌嘉靈達錶(Calinda)讚譽有加。



1995年作者夫婦赴京參加國慶活動時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尉健行合影。



福建省委書記宋德福與作者在2001年6月20日合影。



作者向習近平省長敬杯酒。



福建省政協主席陳明義（右二）接見香港希望工程基金會同仁。



1997年9月在閩港經濟合作促進委員會成立大會上作者獲游德馨省政協主席頒發委員證書。

序

鄒哲開

《商海拾遺》即將出版了，這是林學甫先生多年的心血結晶。學甫先生對香港社會貢獻良多，我與他相識多年，又是福建同鄉，他囑我為本書作序，自然不能推辭。現謹作數語，以示祝賀。

學甫先生是香港鐘錶界成功的企業家之一。他於一九七六年來港，憑着打工攢下的三千元港幣起家，歷盡艱辛，創辦了香港企達集團。在二十多年的默默耕耘中，他自創的「嘉靈達」手錶，以獨特的設計、新穎的款式、優異的質量和良好的售後服務，通過了國際管理系統的認證，獲得了ISO9001證書，暢銷海內外六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嘉靈達」手錶還因設計優美，在世界最具規模的瑞士巴塞爾鐘錶展和香港國際鐘錶展覽會上，三次被選為大會的展館宣傳圖案。

學甫先生在事業有成的同時，積極投身社會活動。他擔任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助理、常務會董和香港福州十邑旅港同鄉會理事長，還擔任福建省政協委員和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他愛國愛港愛家鄉，擁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積極支持以董建華先生為首的特區政府依照《基本法》施政，呼籲廣大港人愛護香港，齊心協力建設香港。他關心內地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一九九一年開始在家鄉投資數億元興建匯達花園，支持福州市的舊城改

造：一九九三年，在上海成立合資企業，經營手錶的製造、加工、出口業務，繼而在上海、廣州等地設立了近六十個零售網點。他多次組團到北京、福建、湖北等地參觀、考察、訪問，捐贈巨款支持當地的教育、文化、慈善事業。

學甫先生勤奮好學，常年筆耕不輟，是香港《文匯報》的專欄作家。工作之餘，青燈之下，他伏案疾書，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建議、感受，發而為文，見諸報刊，與讀者共享，每周一篇，日積月累，竟有一百八十篇之多。其中固不乏真知灼見，更表現了濃濃的愛國愛港情懷。他歡呼香港回歸祖國，堅信香港的明天會更好。他積極向特區政府建議加強香港與內地的聯繫，希望在香港與深圳的交界處建立經濟開發區，以發揮優勢互補的作用。他呼籲在重視發展高科技的同時，要注意加強扶持援助中小企業，使香港的經濟發展有堅實的基礎。他主張既要引進人才，更要培養人才，為此教育要改革，在重視英文的同時，大力加強中文的學習。他希望香港與內地能有更多的交流往來，用了許多篇幅向港人介紹內地的情況。他盼望海峽兩岸早日實現和平統一，堅信祖國的統一富強一定會實現。

對於如何搞好企業管理、加強競爭力、妥善處理勞資關係等方面，學甫先生是爛熟於心，隨意揮灑。小品文也見解獨到，如集中的《「和寡」未必「曲高」》、《矯枉必須過正？》、《「詞窮」未必「理虧」》等篇。還有如《交換名片見誠意》、《握手與待人》、《談碰杯》諸文彷彿信手拈來，卻是小中見大，從日常生活瑣事中悟出待人處世、經商行政的大道理。取喻中外，收攬古今，議論風發，熱情洋溢，卻又曉暢練達，發人深省，這是學甫先生行文的又一特點，也是他文章的魅力所在。

讀學甫先生的《商海拾遺》，使我增長了許多知識，更受到不少啟迪，所以推薦給大家，相信讀者都能從中有所獲

益。我們期望學甫先生繼續寫出更多的好文章，以饗讀者。

2001年6月於香港

（序文作者現任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副主任）

林學甫先生的「牽掛」

——編者的話

李曉惠

每到星期六或星期日，無論有多少要務纏身，也不管是身在香港，還是出差在外，林學甫先生都會擠出整塊的時間，將自己平時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形成文章，準備在《文匯報》星期二刊出的《商海拾遺》專欄中同讀者見面。記不清有多少個夜晚，林先生漏夜伏案趕寫文章，當文稿完成傳真到報社時，已是凌晨二、三點甚至四、五點鐘了。

林先生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他自創的「嘉靈達」手表暢銷海內外60多個國家和地區。同時，他在社會上還擔任了許多重要職務。作為一位有地位的商人，林先生為何對文章之事如此投入呢？翻翻《商海拾遺》這本書就會發現，原來



1999年9月香港鐘錶展期間，作者與前來道賀的專欄顧問李曉惠先生合影。

林先生有一種「牽掛」。

「人不能沒有『牽掛』」，這是林先生專欄文章的一個題目，也是他為人處世的一句名言。林先生說得好，「世人常將人生到了『無牽無掛』或『無求』的階段視為人生之最高境界。其實，筆者以為活到老、學到老、做到老，人生要不斷的有所『牽掛』，有所追求、有所知不足、有所期望，才能有不斷的進步；所帶來的滿足感，才能持久不斷，才能常樂、長樂。換言之，人在持久的追求和探索的過程中，所得到的快樂和滿足感遠勝於面對已有的成績結果。」對有的人來說，「牽掛」可能是一種負擔，一種累贅，拋得越遠越好；對林先生來說，「牽掛」卻是一種追求，一種原動力，沒有「牽掛」會感到「不踏實」，充實的人生總離不開「牽掛」。「人不能沒有『牽掛』」，林先生的這句名言充滿了人生哲理，富有啟迪，體現出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價值觀。

林先生對寫文章不離不棄，靠的，何嘗不是這種連綿不絕的「牽掛」。正如他自己在「牽掛」一文中所說：「作為一個商人，筆者很幸運在《文匯報》這個主流報紙上也擁有一席筆耕的園地。而作為商人，既經商，又參與社會活動，也習文，需付出加倍的努力代價，為不負所托，三年來風雨無阻，每周筆耕不輟，就個人所見、所聞、所思、所牽掛之人和事發表建言、雜感。終有壹拾捌萬言與讀者分享。其間雖常為題材文字而半夜夢迴，輾轉反側，卻茹苦如飴，樂此不疲，靠的，其實也正是這種不斷的『牽掛』。」

林先生為什麼會有這種寫文章的「牽掛」呢？這恐怕要從他的家庭背景、思維特點、文學修養說起。

林先生也可以說是出身於書香門第。父親不但在生意場上很成功，而且也是一位學者。林先生至今還保留著他父親親筆書寫的銀行經濟學的講稿。也許是受父親的影響，林先生對文章之事有一種特別的情感。他一直有個願望，希望將

來為社會、也為子女留下一點文字的東西。

林先生是一個有心人，他對事物的觀察細緻入微。他對「如何交換卡片」，可列出十條注意事項（參見本書第133頁）；對「如何握手」，竟可分出十八種不同情況（參見本書第129頁）。林先生也是一個勤於思考、見解獨到、絕不人云亦云的人。人們常說，「理虧詞窮」，林先生卻反過來說，「詞窮」未必「理虧」；人們習慣說，「曲高和寡」，林先生卻進一步說，「和寡」未必「曲高」，等等。林先生樂於思考，很享受思考過程，也很願意同自己的家人和知己好友分享思考的成果。當終於有機會在《文匯報》發表作品同更多的人分享自己感受的時候，他自然非常珍惜。

林先生有很好的文學修養。記得一九九八年夏天同林先生夫婦結伴遊黃山時，時而聽到他信手拈來幾句古詩詞，以抒發對黃山的讚美之情。相當深厚的文學功底，使他常有一種寫作的衝動，也正是因為有了這個條件，他對文章的「牽掛」能夠由願望變成現實。

林先生的文章因「牽掛」而寫，所以特別用心，特別執著。見到寫作佔去了林先生不少時間，我曾建議他請個「槍手」代筆，林先生也作過這方面的嘗試，但都不成功。因為林先生實在太認真了，「槍手」根據林先生口述內容起草的初稿，林先生差不多都要重新寫過。這不是因為「槍手」寫得不好，而是由於林先生要求無論是文章的思想還是文字的風格，都必須是地地道道自己的作品。於是，親力親為成了林先生的唯一選擇。幾乎每一篇文章、每一句話甚至每一個字，都是出自林先生的手，來自林先生的腦，發自林先生的心。正所謂文如其人，林先生的文章，思想浸透了商人的理念，語言突顯了老板的風格，字裏行間瀰漫著充滿智慧的儒商氣息。《商海拾遺》——一本真正的商人著作。

對文章的「牽掛」，使林先生得到了做生意所得不到的滿

足。自為《文匯報》撰文以後，不少社會知名人士見到林先生時，都提起他的文章。著名的《讀者文摘》及廣東、福建等地的一些報刊，都多次轉載林先生的作品。他關於經濟政策的許多文章，也受到政府部門及其他有關方面的重視。最使他感到滿足的，是他的建言在政府的政策中體現出來，如他一九九九年提出「輸入優才不應只限博士」（參見本書第219頁），政府今年就取消了「博士」的限制。最為他津津樂道的，是他最先公開提出「前港督府」應改名的問題（參見本書第68頁），雖然「前港督府」新名沒有採用他的建議，但改名本身已使他感到很有成功感。最令他感到自豪的，是他於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四日在《文匯報》上發表題為《緊急援助中小企業》的文章之後，行政長官董建華委托有關部門官員約見林先生，希望就政府如何援助中小企業問題進一步聽取他的意見。雖然後來由於董特首臨時出外未能當面聽取建議，但林先生有關大幅提高政府承擔貸款風險比例的建議得到政府接納。

《商海拾遺》一書共有七個部分：（一）營商篇，（二）說文篇，（三）處世篇，（四）經濟篇，（五）議政篇，（六）活動篇，（七）附錄。這裡面既有林先生營商做人的體會，也有他對社會事務尤其是經濟政策方面的建言，還有他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的記錄，香港及內地許多報刊對林先生的介紹及訪問亦收錄其中，再加上精心挑選的照片，整本書既內容全面充實，又圖文並茂，非常精美。

林先生的文章結集出版，他的夫人、子女一定非常高興。林太理解先生的「牽掛」，她常常是林先生文章的第一讀者。林太雖然有時也為丈夫因寫文章過分勞累而心痛不已，但更多的是，看到先生的文章越寫越好而由衷欣喜，看到先生多了一種高品味的精神追求和寄托而感到安慰。林先生的博士女兒有一次問我：「我爸爸將寫文章看成是一種新的事

業，他的文章真的寫得很好嗎？」我當時的簡單回答不可能滿足她的要求，現在，《商海拾遺》一書的出版，相信可以給她一個完整的答案。

林先生視我為知己，我深深以此為榮。作為一個報紙的編輯，能夠同成功的商人結為知己，「竅門」何在？說起來也簡單，就是要「善解人意」。「善解人意」，既是為人處世的一種態度和方法，也是做好編輯工作的一種技巧和要求。處理作者的稿件是編輯的一項重要工作。不理解作者的編輯，很難說是一個好編輯。編輯有時處理稿件出現偏差甚至錯誤，好多時正是由於對作者及其稿件缺乏理解。林先生看中我的，正是我對他的一種理解。他常常對一些事物有自己獨特的看法，正因為獨特，往往不容易被一般人理解。每當我同林先生交談和拜讀他的文章時，我決不急於用自己的看法或一般人的看法，想當然地對其進行判斷，而是先順著他的思路去理解，在真正了解了他的思想之後，才說我的看法。林先生常常為他的思想能夠被我理解而感到高興，而我又何嘗不是從理解林先生的獨特見解中受到啟發而感到興奮呢？正因為如此，我們見面或通電話時，常常是談起來就沒完沒了，也正因為如此，我也成了林先生可信賴的編輯。

在林先生的文章結集出版的時候，作為林先生文章的編輯（雖然從不掛名），我寫這篇文章，是想方便讀者了解林先生和他的《商海拾遺》這本書；作為林先生的朋友，我也希望寫些文字，作為我們友誼的一個紀念。

我的親人和我的學校

——作者的話

林學甫

一個人每當達到一個曾認為難以實現的目標時，除了為自己慶幸外，還總會自我感懷一番，這是人之常情，筆者更是不能例外。我的《商海拾遺》，是一個經商的人首次出版的文集。此時的我，會有更多的滿足感，對我培養育我的親人以及幫助啟發我並給我靈感完成此書的人，想說更多感激的話語。

我出生在福建省福清市一個貧窮的鄉村——東嶠村。先祖父林仁漢（一九七五年九十歲時於上海逝世）出身貧寒，幼時生活淒苦，目不識丁，三十歲別妻離兒飄洋過海，僑居印尼三十載，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一日離開印尼回國定居。筆者至今仍珍存祖父印尼的離境簽證。僑居印尼期間，祖父曾九次回國，買田地蓋大屋，供家父上大學，創一番事業。祖父一輩子吃苦耐勞，堅忍不拔，誠信處事，誠懇待人。自幼與祖父一起生活，耳濡目染，這對筆者後來事業的發展和商譽的建立是有着深遠的影響。在我的心田深處，祖父當年回國蓋大屋，甚至當年送我一塊伴隨他終生的亞米茄老式掛錶，對後來的我選擇鐘錶業、要兒子學建築、以及在家鄉搞房地產都起着潛移默化的作用。

家父林經建（又名維福）為了謀生和我們也是聚少離



作者至今珍藏祖父贈送的亞米茄老式掛錶，極為普通的錶繩反映出作者祖父的生活十分簡樸。

多。祖父回國前，所謂「我們」是包括祖母、姑姑、母親、兄姐弟等七人。說起筆者對「書」的興趣及對文學的愛好，是與父親的影響分不開的。記得兒時見到在鄰近的平潭縣教書的父親回家時，總是抬着成箱的書。正是父親離開家鄉後長期存放在閣樓上的一箱書，使筆者在兒時有了較早接觸書籍的機會。父親僑居印尼四十年間，從獨資捐助家鄉設置自來水、供電到發起興建老人會、捐助學校等。父輩熱愛家鄉的傳統默默中也對子女有着極大的影響。筆者於一九八七年對中華文學基金會的捐資（曾獲當年基金會名譽會長萬里、會長巴金簽發榮譽證書）、一九九八年在北京66中學創立獎教基金，以及捐建希望小學、圖書館、家鄉政府辦公樓、擔任

福建省希望工程籌委主席以及積極參與社團活動等，也可以說都是相承於父親的精神。今年，我與同鄉會同仁們再次踏足平潭縣共同捐建希望小學，其實在感覺上也是在尋找着先父昔日的足跡呢！

我特別銘刻在心的，是我的祖母（九十六歲時在港逝世）和母親大人。在祖父和父親離開家鄉謀生、僑居海外的漫長歲月裏，祖母和母親克勤克儉持家，撫育培養我兄弟姐妹長大成人。我重情的性格可以說是來自母輩的天然傳承。

還有一個對我影響至深的人，這就是叔叔林維建。叔叔在十一歲時就跟隨祖父僑居印尼。和叔父相交幾十年的著名印尼僑領、鄉賢林文鏡、林運茂昆仲，至今見面時還津津樂道地談及我叔父「從年青時就非常愛國」的事跡。每次聽到這話時，我心裏就感到十分的自豪和親切。筆者至今還保存着叔叔一九五五年在印尼結婚時的囍帖，帖上註明以祖父林仁漢的名義將賀儀全數捐給愛國社團玉融公會。記得讀小學時，叔叔第一次給我兄弟的信中，在回憶家鄉田園風貌時，還不忘教導我們要熱愛祖國。

一九六二年筆者在福清第一中學高中畢業時，國家正處在困難時期。在上海同濟大學就讀的家兄林學凌當時得到上海市政府優待華僑的一個政策訊息，即可用外匯購買專為歸僑僑眷建造的公寓。當時正值家父創辦的銀行業務發展順利，故匯款回國購屋後全家得以移居上海。定居一年後，在國家整體經濟仍然困難，就業不易的情況下，多謝政府對僑眷的照顧，我先後進入兩家為一般人所羨慕的工廠學習，從事高精密度量具量儀維修和精密產品測試技術工作十餘年。我還利用業餘時間在上海業餘工學院機械製造系學習。這些經歷為後來到港後從事有一定精密度要求的鐘錶業得到發展，奠定了重要的技術基礎。

後來，父親的銀行經營失敗，給我帶來不小的精神打

擊，甚至一度產生頹廢和自卑的情緒。一九七六年初，我和內子及小女一家三口獲准出境。到港後，我立志發奮努力，吃得苦中苦，希望有朝一日憑自己的雙手創一番事業，為父親爭氣。

經多年的辛勤耕耘，在業內漸見進取，得到同行的支持，本人於一九八七年起連續三屆獲香港四大商會之一的中華廠商聯合會分別推選為鐘錶業小組主任、主席。作為製造業中人，我終於找到了中華廠商聯合會這個可拓寬國際視野及加強商界交往認識的最佳途徑，並歷任會董、常務會董、會長助理至今。可以說廠商會是本人文集創作靈感的重要源泉！在此衷心地感謝在廠商會這個大學校中歷屆會長、會董及全體同仁對本人的悉心栽培和給予學習的機會！

《文匯報》也是我的學校。作為讀者兼寫稿人，和《文匯報》朝夕相處、長相廝守、不離不棄。正是《文匯報》把我從過去的讀者同時變成今日的作者。多年來，在報社領導、編輯及記者的耐心指導和鼓勵下，在跟《文匯報》的發展亦步亦趨中，日就月將，終於能夠撰寫發表文章並匯集成書。我深感《文匯報》有如一間大學堂，《文匯報》之博大精深真可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沒有《文匯報》，就不會有我的《商海拾遺》這本書。

身為商人，三年多來在《商海拾遺》專欄中所寫的文章，已被不少的讀者所認識。然而今將一百八十餘篇拙作匯編成書出版，是否也有一定的「市場」支持？為此疑問，曾專誠帶備文章拜訪請教了我們福州十邑旅港同鄉會名譽會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鄒哲開先生。鄒副主任是個十分關心鄉親的領導人。不久，鄒副主任還更應允為拙著作序。我拜讀序文，除驚嘆鄒副主任對筆者的思路有如此全面的了解外，更重要和令人難以忘懷的是，字裏行間對筆者既充滿着熱情的鼓勵，又飽含了真摯的